



苏区研究丛书

主编 ● 陈绵水

困境与变革

——江西国统区社会动员研究：
以苏区为参照(1928—1945)

晏雪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苏 区 研 究 丛 书

主编 ● 陈绵水

困境与变革

——江西国统区社会动员研究：
以苏区为参照(1928-1945)

晏雪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困境与变革:江西国统区社会动员研究(1928—1945)/晏雪平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161-1531-2

I. ①困… II. ①晏… III. ①政治动员—研究—江西省—
1928~1945 IV. ①D69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75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任晓晓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302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陈绵水

—

1927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其后，中国共产党以星火燎原之势，领导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西北、湘鄂川黔等大小十几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些革命根据地中，通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有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乡、区、县乃至省级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政府。这些革命根据地因之被人们称为“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

苏区鼎盛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除直接辖有中央苏区外，还辖有湘赣省、湘鄂赣省、赣东北（闽浙省、鄂豫皖省、川陕省、湘鄂西省）等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琼崖、左右江、闽东、陕甘边、陕北等苏维埃政权一起，总面积约40余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000万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它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根据地建设，扩大了党和红色政权的影响，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新局面，也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从1927年兴起到1937年结束，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经历了10年的时

间。10年苏维埃运动,起伏曲折,兴替相接,以宏大的目标和独特的内涵,英勇的奋斗和重大的牺牲,构成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重要历史阶段,给波澜壮阔的中国现当代历史留下了一部绚丽的篇章。

在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苏区精神:“坚定信念”,突出体现在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苏区精神的灵魂所在。“求真务实”,突出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是苏区精神的核心内涵。“一心为民”,突出体现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是苏区精神的宗旨要求。“清正廉洁”,突出体现在践行“苏区干部好作风”,是苏区精神的本质特征。“艰苦奋斗”,突出表现在“创业艰难百战多”,是苏区精神的基本要求。“争创一流”,突出表现在创造“第一等的工作”,是苏区精神的显著特点。“无私奉献”,突出体现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是苏区精神的重要方面。

苏区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从本质上看,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凝聚而成的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根植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沃土,又融合中国革命战争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风格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宝贵精神财富。苏区精神具有革命性、民族性、时代性相统一的品格,是一种能够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苏区精神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是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的延伸和发展,也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

二

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战争创伤等多方面原因,原苏区地区现在的发展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党中央、国务院对苏区的振兴发展历来高度重视,始终心系苏区,始终牵挂和关心着苏区人民,关注苏区精神。1951年8月,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委派谢觉哉为团长带领中央慰问团来到江西和赣南老区,送来了毛泽东“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亲笔题词。1996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赣南老区视察时指出:“我

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老区人民。我们要把老区的精神和传统世代代传下去，永远发扬光大！”胡锦涛同志2003年8月视察赣南老区时强调：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我们坚定信念、鼓舞斗志、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永远是我们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政策上给予了原苏区许多特殊的关照和巨大的倾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更是把加快原苏区振兴发展，摆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重视程度、支持力度前所未有的。2011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现在不少革命老区的发展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我们要继续大力关心老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切实帮助老区加快致富发展步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让老区人民生活得更加富裕、更加幸福。”201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以国家战略全面支持陕甘宁革命老区发展，老区迈上了经济、社会、生态等全面振兴的新起点。6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给加快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送来了及时雨、雪中炭，是加快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极为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标志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发展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历史纪元。

振兴原苏区，加快全国革命老区发展，既是一项重大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计划”是国家重大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决策，而以原中央苏区为代表的原苏区地域，既是中国当代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又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拥有重大潜力的地区，还是具有人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振兴对策进行研究，

既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近年来,江西师范大学在已有的学科平台基础上,进一步突出并发挥学科优势,联合省内外有志于苏区研究的学者,凝练学科方向,注重社会服务,积极开展苏区振兴研究,并以现有的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传统社会与江西现代化研究中心”,以及“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研究中心”和“区域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为基础,组建苏区振兴研究院,主要围绕苏区研究、原苏区地域历史文化研究、原苏区振兴对策研究三个方向展开。

苏区史研究不但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而且是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要立足江西、面向全国,主攻苏区史、会通民国史,注重在研究中不断创新和拓展视野,使苏区史研究逐步呈现出整体性、多样性和学术性特点,尽可能地反映当前学术界的主流成果和前沿问题,同时,需要在核心问题上进行创新和突破。

原苏区地域历史文化研究,即前后苏区时代研究,将原苏区地域置于较长时段的社会变革视野中,关注历史时期尤其是明清以来江南腹地传统社会变迁,注重在历史大时空中叙述、分析苏区史,将苏区史的研究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层面,使苏区时期存在及发生的许多问题,得到深层次的解释。

原苏区振兴对策研究,既是为经济尚欠发达的原苏区地域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也是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计划”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坚持学术研究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服务,发挥知识界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

目前,苏区振兴研究团队成员承担了中央苏区振兴重大研究课题“中央苏区基础设施与公共能力建设研究”、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课题“振兴原中央苏区的现实条件、产业布局和财税政策研究”等项目,出版了《江西传统社会与近代转型》丛书、《苏区革命与农村社会变迁》等著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这次出版著作中的四部,均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修订,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特定的地域为个案或中心,对中央苏区或江西进行了讨论,是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部分成果的展示。作者们坚持史料和理论并重,十分注重史料的收集与考辨,比较熟练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同时也借鉴引用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论文集《苏区研究论文精粹》，则收录了我省老中青三代学者对苏区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有关原苏区地域历史文化研究、原苏区振兴对策研究的两组著作也在修订中，将在近期出版。

弘扬苏区精神，增强学术研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推出更好的作品，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我们的宗旨。上述著作的撰写和出版，仅仅是我们进行苏区研究的部分成果，更多的成果将以论文和调研报告的方式持续发表。

2012 年 9 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	(1)
第二节 学术史	(4)
第三节 基本史料与框架	(18)
第一章 田赋改革	(22)
第一节 民国江西田赋弊病	(22)
第二节 田赋改革	(34)
第三节 田赋改革的成效	(80)
第二章 地政改革	(84)
第一节 土地测量的推行	(84)
第二节 土地数字的考辨	(107)
第三节 土地税的变化	(117)
第三章 粮食统制	(130)
第一节 1941 年以前之粮食市场	(130)
第二节 战前粮价问题	(172)
第三节 粮食统制政策的实行	(194)
第四章 农村合作运动	(217)
第一节 30 年代的农村危机	(218)

2 困境与变革：江西国统区社会动员研究（1928—1945） 〈〈〈

第二节 30 年代农村合作的推行	（228）
第三节 抗战期间的农村合作	（246）
结语	（259）
参考资料	（262）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华民国得以建立。无论北洋军阀政府如何腐败，如何具有“封建性”，不可否认的是，此时的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世界近代国家的行列。但这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经济、社会、思想、政治等各方面都较之前有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因素、外来的因素交叉碰撞，其中虽有融合，但更多的是碰撞。而对于近代国家来说，其要面临的是如何消弭变革时期所带来的矛盾。因为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正是来源于解决各种危机的成功与否。如果不能合理地解决各方面的危机，则必然会引发各种紧张局面，国家的权威被削弱，甚至会导致战争与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最终导致了其政府垮台，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得以登上历史舞台。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等，在几十年的尝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治国纲领。国民党较之于北洋军阀的优势在于其有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诱人的纲领，而改组后的国民党凝聚力的增强也为其革命的成功奠定了组织基础。

但是，取得政权之后的国民党实际上也面临着北洋政府曾经面对同样的问题，即如何解决变革时期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矛盾。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危机就国内而言，首先是共产党的问题，自 1927 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及随后的汪精卫“分共”之后，国共合作失败，中共转而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建立红色割据政权，而国共的十年内战也自此时开始。当时红色政权发展很快，特别是中央苏区的发展使江西半壁被“赤化”，而影响所及，福建、广东、湖南等省部分

地区亦被并入红色版图。如何“剿灭赤色政权”是国民党必须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其次,北伐虽然取得成功,旧军阀被消灭,但是新的军阀取而代之,地方分离主义也使得国民党政权并不那么稳固。因此,如何消除新军阀的地方割据是国民政府面临的第二个问题。第三,农村经济濒临破产。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中国对外贸易逆差越来越严重,农村各项产业全面衰退,而苏区则由于战争破坏,农村危机进一步加剧。如何改善农村经济亦是当时政府所面临的问题。而就国际上而言,世界大战的阴影越来越浓,日本对于东三省及华北的蚕食也在逐渐将中国推向战争的泥潭。总之,以“内忧外患”一词可以恰当地形容当时的困境。

国民政府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人力、财力,为达此目的,则必须增强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加强国家控制力。因此打破既有制度,重新建立有利于新政府的秩序就非常必要,这正是社会动员的过程。“动员”一词在民国时期频繁见诸报纸、杂志,这也正是近代国家力图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的写照。什么是社会动员?学界见仁见智,美国学者艾森斯塔德在《现代化:对抗与变迁》(1965)中认为,社会动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一系列旧的落后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习惯的破除,人们开始接受并适应新的社会化和行为类型。^①艾氏所定义的社会动员正是以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变为背景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情况正符合此,而有所不同的是,艾氏定义的社会动员是以民众为第一视角的。但是以中国的情形而言,传统社会向近代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动员是以政府或政党为主导的。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于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动员模式有深刻的论述,亨氏认为传统社会秩序出现危机,社会各阶层、团体因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诉求而矛盾加剧,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各阶层的诉求,新的政府必须重新制定相应制度、政策,以缓和这种社会紧张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阶层的诉求得到满足,有些阶层并不能满意,因此会出现暴力冲突、骚乱、示威、游行等运动。同时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建立,对原有社会秩序造成了更为彻底的瓦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就是社会动员的过

^① [美] S. N.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对抗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程。^① 亨氏认为,正是社会危机的产生使政府必须发动社会动员,改变既有的制度、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制度与秩序。而政府主导的社会动员方式,主要是一种组织动员、领导动员、层层动员的方式。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主要渠道以及政策、观念、价值取向、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依靠各级组织,由领导层层传达,层层动员。

本书的研究对象正是这种政府所主导的社会动员。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亦面临着上述各种危机。首先是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的蓬勃发展,国共两党在江西鏖战多年。就国民政府而言,江西是“剿匪”的重点区域,对此区加强控制、革除弊政,动员人力、物力以取得“剿匪”胜利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国民政府所实施的很多项社会动员政策都以江西为重点。这是本书选择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作为考察社会动员对象的原因之一。其次,江西在国民政府时期亦是相对落后地区,此区在遭受战争、自然灾害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农村经济日益窘迫。抗战时江西亦未能幸免于难,1939年赣北大部沦陷,江西亦处于抗战的前线。可以说江西是此时代中国社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省份。此外,江西自1931—1946年间省政府之施政方针比较具有连贯性,比较有利于探讨国民政府时期社会动员过程。熊式辉于1931—1941年这10年间,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有许多制度上的改进。而继任者曹浩森亦是由熊荐任,曹在位5年,奉行“熊规曹随”,其前任所实施的各项改革被继承下来。

15年中江西所实施的各项制度改革与创新,本书选取田赋改革、地政改革、粮食统制及农村合作运动四个方面来进行探讨。首先,田赋改革是当时政府为革除前清赋税征收之弊病,以新的田赋征收制度取而代之,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改革,可以视其为财政上的动员。其次,地政改革首先可以视为孙中山“平均地权”纲领的实施。地政改革的目的在于清查全省土地,改征地价税。征收地价税正是孙氏“平均地权”的实现手段。地政改革在清查全省土地中是有其作用的,其最少改变了此前“田不属粮”,即田赋与土地完全脱钩的弊病。土地清查对于加强政府对土地资源的控制是有积极作用的。再次,粮食统制本是抗战时期在国统区普遍实施的一项战时经济政策,但是从江西的情况可以知道,早在抗战爆发前的30年代初期,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江西就已经发生了粮食危机,

①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原本作为主要粮食输出省份的江西米谷出口日渐萎缩,很多县份甚至产生粮食恐慌。30年代江西屡次禁止米谷出境正是粮食供应不足所导致的。抗战之前,江西就已经开始了粮食管制,抗战时期的粮食统制只是在此基础上的全面展开。可以说,江西粮食统制是动员农村经济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政府加强对于粮食的控制,正是基于粮食危机而作出的反应。第四,国民政府时期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与农民赤贫化又使农村合作社得以大规模推行。江西农村合作社最早是为救济收复的“匪区”而设,并在此后作为复兴江西农村经济的一项法宝。抗战以后,合作社则被作为稳定农村,动员农村人力、物力支援抗战的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社被彻底行政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开始渗透到农村经济的各个角落,其对农村之控制在经济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农村合作社亦是国民政府对农村经济资源进行控制与动员的结果。

此处要提请注意的是,本书的论述是以国民政府为第一人称,资料中及论文叙述中出现的“剿匪”、“匪区”、“匪患”等词眼均只是为了方便表述起见,并不存在任何政治立场。

第二节 学术史

本书的研究重点是近代国家社会动员的过程。以上节的论述可知,社会动员是旧制度与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制度与社会秩序重新建立的过程。因此,本书所涉及的学术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近代化问题,民国时期地政改革、田赋改革、粮食统制及农村合作社等问题。

一 近代化问题

社会动员从本质上而言,仍然是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的一部分。但社会动员强调的是近代国家在变革时代如何打破与创建政治与经济秩序。近代化的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近代化问题研究的核心是如何来解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由此衍生出来的问题是如何去认识传统社会,近代社会如何有别于传统社会,传统的因素与近代的因素有无内在联系?甚至近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划分是否

合理?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过程逐渐形成不同的解释模式。

1. “冲击—反应”模式

“冲击—反应”模式是二战以后兴起的一种解释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理论模式,以美国学者费正清为代表。该模式认为,在西方对中国施加影响以前,中国是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而只有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冲击,才使中国全面停滞发展的社会被打破,被迫开始接受西方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制度,从而开启了近代化的大门。在这个理论模式中,西方是处于优势地位的,而东方则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①“冲击—反应”模式将研究的重心放在西方因素在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上,对中国传统的、内部的因素淡化处理,中国近代史某种程度上成了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传播史。

2. 帝国主义模式

应当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大多采用此种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化的问题。此种模式与“冲击—反应”模式相似点在于也认为西方的因素在近代化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即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既有的发展道路被中断。其不同点在于,比较偏重于外来因素的负面效应,即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把中国拉入世界殖民体系中,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在侵略的过程中本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而民族资本主义也在帝国主义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延伸开来,当时中国的近代化是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其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或买办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而北洋政府以及之后的国民政府并不能引导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除非三座大山被推翻。因此,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近代化唯一的希望,而共产党也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的使命,中国自此走上了富强的道路。^②90年代以前的大陆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专注于中国社会为何长期停滞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为何会夭折等问题的研究也正是这种理论模式下问题意识的反映。

① 该理论模式的代表著作是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J.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② 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如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 中国中心观

中国中心观是70年代由美国学者保罗·柯文提出,该理论矛头直指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倡导从中国发现历史。柯文力图纠正费正清以来中国近代化历史研究中过分偏重于西方因素的不足,主张要从中国本身发现历史变化的脉络。^①自柯文“中国中心观”提出后,史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中国方面来。同时期施坚雅对中国内地区域市场的研究影响很大,也逐渐将研究者的注意力拉到中国本土社会。^②伊懋可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对中国传统农业进行研究,认为中国传统农业遭遇“高水平均衡陷阱”,导致中国社会发展停滞不前。^③而之后黄宗智在其《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书中对此理论进一步发挥,认为当时中国农业经济存在“过密化”的问题,其结果是劳动边际收入得不偿失,中国农村因此而停滞不前。^④而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则对“过密化”问题提出异议,认为1800年以前,中国农业发展并未过密化。^⑤而黄氏对此也有回应。^⑥李伯重通过对江南农业生产力的研究也意图驳倒所谓“过密化”问题。^⑦此外,罗威廉对汉口的研究、滨下武志对于朝贡贸易的研究也使得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⑧总之,伊懋可、黄宗智、彭慕兰、李伯重等人从各

① [美] 保罗·柯文 (Cohen Paul):《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② [美] 施坚雅 (William Skinner):《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施坚雅 (William Skinner):《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④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⑤ [美]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⑥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 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⑦ 可参见李伯重《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等。

⑧ [美] 罗威廉 (William T. Rowe):《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87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日]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9年版。

自的研究出发，或支持停滞论，或不以为然。总之，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关注点已经转移到中国本土社会。

我们暂且不管这些争论的对错，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来看都是如此。这些变化有些令人欢欣鼓舞，但由于其对原有制度、秩序、习惯的冲击，也给当时中国社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危机。因此，本书更多地关注旧的制度、秩序被打破以后新的制度、秩序重建的过程。当时中国社会如何去解决近代以来的各种危机？制度与秩序创建的过程中遭遇了哪些问题？以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而言，知识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其基本上主导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各项制度变革，而其中又以国民党与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最为重要。在当时看来，这两党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亦可称纲领），两党的斗争也贯穿了 20 年代至 4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这种斗争称之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亦不为过。最终，共产党在角逐中胜出，国民党退出大陆。共产党作为胜利者，对其的研究自然会比较彻底，党史研究者功不可没。然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作为失败者，其所施行的另一套纲领是否就没有必要研究呢？笔者不以为然，他山之石尚能攻玉，更何况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大陆也有 20 余年的统治。其执行的另一条路线是怎么实施的，其遭遇了哪些问题？其不但对旧制度、旧秩序进行了革新，同时也有新制度、新秩序的创建，这些革新与创建也是近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近代社会动员的重要部分。本书将研究的重点放到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动员上也正基于此。

二 近代国家相关问题研究

近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民族主义的兴起。以中国而言，19 世纪中叶以来，民族主义逐渐兴起，并最终建立了中华民国。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有关民族主义的理论来源、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形成过程及其与世界主义、民主主义的关